

批判理论现代性反思经验的引入

——读傅永军著《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王凤才

山东大学教授傅永军博士撰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一书，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傅永军教授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解释为“一种从社会批判角度叙述现代社会理性建构的理论”，“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理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之理性辩证法的现代性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该理论通过厘清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在韦伯合理性思想平台上，析取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解视界和反思（批判、重构）路径，详尽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几种典型表现——解放的现代性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重建的现代性理论，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联结成一个具有不断扩展特征的有机体系。最后，作者又将研究触角延伸到现实世界，回答了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的普适价值以及它对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意义等为大众所关心的现实性极强的问题。

我对傅著所研究的问题皆有浓厚兴趣，但最感兴趣的是傅著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批判理论的现代性反思经验能否成功引入后发现代性国家，而对后者构建自己的现代性具有借鉴意义。有关这个问题，傅永军教授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尽管这个回答是基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这样一个个案作出的，但却没有单一学派狭隘的视野，反而具有超越地域及民族特殊思维的普遍意义。

我之所以如此说，是有着充分的文本根据的。在结语部分，傅永军教授精辟的分析表明，是西方启蒙进步话语的逐渐全球化，以及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启蒙理想的认同与接受，使得“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接受西方现代性经验以及利用西方启蒙价值资源改造各个具有民族性的价值系统和生存样式，使之成为理性启蒙了的价值系统和生存样式”。从而使得“现代性不单单是西方的事情，它在全球范围获得了响应。全球化的历史不仅是各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更是各个民族国家或‘被迫’或‘自觉’选择现代性的历史”。

难能可贵的是，傅永军教授并没有被现代性的这种“西化”表现所蒙蔽。他的分析表明，全球现代性的叙述模式必须突破西方—非西方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承认现代性已经呈现出一种多种模式并存与竞争之格局。因此，无论是从理念角度看，还是从经验角度看，现代性与民族性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完全可以和谐并存。基于这样一种非对抗的对话立场，傅永军教授指出：“无论哪一种现代性模式，即使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都没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体性的反西方主义为其前提。这样才能保证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能够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质态与结构，既保留传统社会的基质又吸收后传统社会的新质，既有与西方现代性相互涵容、相互顺适的因子，又有与之相互反驳、相互矫正的成分，从而使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因充满张力而出现一种辩证的互动”。由是观之，包括批判理论现代性理论在内的西方各类现代性经验的普适价值在于：“西方的现代性经验、西方的现代性观念以及西方的各种现代性理论，是作为我们的‘他者’存在的，这种‘他者’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他山之石’，可以激发出我们自己本有的理性化潜力，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现代性意识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确立我们自己独特的现代性发展路径。”

不要把这种对待西方现代性经验的态度，仅仅看作是一种宽容的姿态，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待西方各种现代性经验的现实可行的策略。观“域外”而鉴“自身”，是各后发现代性国家借助对西方各种现代性经验的反思而独创各具民族特色且现实可行的现代性建设路径的不二选择。这种选择既具有开放的品格又坚持民族的根基，脚踏实地而又视野弘恢。

非西方学者的西学研究，治学的境界应该是既要研究从被研究对象那里发现的问题，又要对解决本民族所面对的现实难题有所助益。《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一书通过对批判理论现代性理论的系统爬梳，很好地做到了这两点。这样一问题意识鲜明，社会关怀切实的厚重之作，将作者的理论创新冲动和实践意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创获，我们能够真切地从这部有着理论深度的著作中体会到作者研究的思想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